

碑刻视野下孔林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初探

胡娜



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，占地约200万平方米，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、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地，是世界文化遗产“三孔”的核心组成部分，也是拥有坟冢十万余座、碑刻六千余通、树木近十万株的复合型文化景观，其两千余年的营建史始终贯穿着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傳統智慧。

碑刻文献所见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历史演进

元代：筑垣设门——建筑护林格局的奠基 元代以前，孔林为开放型家族墓地，林木虽受礼法与官府的双重保护，但缺乏物理屏障，周边樵采、放牧屡禁不止，林木资源损耗严重。元至顺二年（1331），曲阜县尹孔思凯主持修筑孔林周垣、营建宣圣林神门，其事详载于《宣圣林神门记碑》。

此次工程的核心逻辑，是以建筑手段构建生态防护边界，周长十余里的林墙划定了清晰的遗产范围，将人为干扰阻隔于林外；宣圣林神门作为唯一的正式出入口，承担着出入管控与礼制标识的双重功能。这是孔林历史上首次系统性的防护工程，标志着古建筑从单纯的礼制空间载体，拓展出护林防樵的实用功能，“墙垣围护、门坊管控、林木掩映、墓葬居中”的基本保护格局正式确立，为后世协同保护奠定了制度与空间基础。

明代：林建同步——协同营缮体系的成型 明代是孔林空间格局的定型期，协同保护从物理防护延伸到工程营建与制度管控层面，形成了“硬件建设+制度约束”的双重体系。

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《创建林园墙记碑》记载，曲阜世尹孔克中针对周边民居密集、樵采禁而不停的问题，在增修林墙、门宇的基础上，增设巡护值守并配置专职巡查人员，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。由此，孔林形成了“墙垣一门坊一巡守”三位一体的建筑防护体系，护林制度从法令条文落地为日常管理实践，管控效能显著提升。

弘治七年（1494）《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》则集中体现了“林建同步”的营缮理念。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主持林庙大修，重修驻跸亭、享殿，加高神门楼观，增设深水桥栏杆，完善礼制建筑体系；同时“手植神道桧柏数千株”，沿祭祀轴线补植林木，强化空间的礼制序列感。建筑营缮与林木补植同规划、同施工、同验收，既优化了建筑的功能布局，又通过树木强化了祭祀空间的仪式感，是协同保护理念的典型实践。

崇祯八年（1635）《重修林记碑》记载，兖东兵备道李一鳌捐资修林，遵循“全敝者更，半敝者葺”的原则，在整飭林坊、林门、享殿等主体建筑的同时，重点维护植楷榿亭、庐墓堂等与古树文化紧密关联的纪念建筑，保障了文化地标的完整性。此外，明代《禁止孔林樵伐碑》虽残损严重，仅存“碑树楷禁伐府道司院”等可辨识文字，但足以印证当时已建立多级官方参与的林木禁伐制度，与林墙的物理防护形成软硬结合的管控体系。而以子贡手植楷为核心的文化古树，始终配套有植楷亭、碑刻等纪念建筑，历代同步修缮，是微观层面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生动缩影。

清代：系统治理——协同保护制度的成熟 清代孔林保护进入精细化、制度化阶段，形成了“培育+管控”的完整治理闭环，其中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的林木补植工程最具代表性。

据《补种孔林树木记碑》记载，因连年干旱，孔林幼树枯死、老树枯槁，山东巡抚觉罗长麟率僚属捐出俸银，购置桧柏等适生树种五千株，于冬季农闲时节栽植，遴选专业园艺匠师负责技术管护，设置专职护林户日常巡查；同时衍圣公府率族人员按片区同步补植，所有新植林木统一造册登记。《圣林补植树木志功碑》则补充记载，此次添种补植松柏樟楠近万株，并配套疏浚洙水河道，改善林地水土条件，使新老林木重焕生机。碑文更提出“草木兴衰与文运相关”的论断，将林木保护上升到传承文脉的高度。

此次补植工程最突出的特点，是严格依从原有神道轴线，墓冢布局与建筑秩序选种定植，确保林木更新不破坏文化遗产的整体风貌；同时将林木补植、水利配套、专职管护统筹推进，实现了系统治理。《闾里文献考》所载孔林“缭垣十里，树以万计”的繁盛格局，正是建筑防护、工程补植、制度管控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，标志着孔林协同保护体系达到成熟完备的阶段。

传统智慧传承下的协同保护优化路径

历经两千余年的磨合与调适，孔林的古树与古建筑已形成深度耦合的共生关系，二者在文化、生态维度彼此成就、不可分割，共同构成了孔林的遗产价值核心。建筑赋予树木礼制身份与文化意义，树木赋予建筑精神内涵与历史厚重感，二者共同承载着儒家“慎终追远”的文化内涵，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文化生态互动，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“林养建筑、建筑护林”的朴素认知，这正是当代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共生的历史原型。孔林历代协同保护的历史经验，为破解当代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，传承“林建一体”的系统性保护观，结合现代治理手段，可从五方面优化协同保护体系。

一是树立系统性保护理念，构建协同保护机制。借鉴古代“整体营缮、林建同步”的历史传统，依托全国首批“国保单位·古树名木”协同保护名录建设契机，建立文物、林业等多部门联合评审机制。凡涉及古建筑修缮、古树重大养护的工程，均开展双向影响评估，确保工程对古树与建筑双向友好。编制孔林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专项规划，明确保护目标、技术准则与权责分工，从顶层设计层面保障系统性保护协同。

二是开展系统性普查，搭建联动数字管理体系。在现有古树普查与古建筑普查成果基础上，开展孔林古树与建筑的关联性专项普查，逐一核查记录每株古树与周边建筑的空间位置关系、相互影响状态，建立“一树一建筑一档案”的数字化管理系统。运用遥感监测、物联网传感等技术手段，对古树生态态势与建筑健康状况开展同步动态监测，实现数据共享与联动预警。引入景观生态学分析方法，识别林内关键生态节点与生态廊道，为林木更新复壮、环境综合整治提供科学依据，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协同保护的精准化水平。

三是推广兼容性技术，实现保护工程双向增益。在古建筑修缮中，推广应用古树友好型施工技术，搭设施工脚手架避让古树枝干，必要时采取柔性防护措施；工程渣土及时清运，避免改变古树根域土壤环境。在古树养护中，充分兼顾古建筑保护需求：对紧邻古建筑的古树，采用微创修剪、支撑加固等方式处置危枯枝条，避免大枝坠落损伤建筑；古树复壮工程须避让建筑地基，采用透气铺装、渗灌系统等地下干预措施，降低地面作业对建筑台基的扰动破坏；病虫害防治优先采用生物防治技术，防止农药污染建筑彩画与石质构件。系统总结传承传统治理经验，构建精准化的协同保护技术体系。

四是完善风险防控体系，提升协同应对能力。针对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，构建古树—建筑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。编制专项应急预案，明确大风、暴雨、雷电等灾害场景下的协同处置流程。对古树与建筑交错分布的重点区域，定期开展联合风险排查评估，分级分类落实预防性保护措施。引入古树名木综合保险等金融工具，统筹古树与古建筑的风险保障需求；探索推行古树与古建筑一体化综合保险，构建复合型遗产风险分担机制。

五是挖掘历史文化内涵，推动协同保护价值传播。系统挖掘碑刻文献中蕴含的协同保护传统智慧，讲好孔林“建筑与树木共生”的文化故事。将碑刻所载历代植树、护林史实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，通过主题展览、导览解说、数字化展示等多元形式，向公众传播协同保护理念，提升公众对古树与建筑双重遗产价值的认知。在文旅活化利用中，打造“古树+古建筑”主题游览线路，引导游客从整体文化景观视角认知孔林，避免孤立看待建筑与林木。通过文化传播引导公众形成共识：保护古树就是守护建筑的生态环境，保护建筑就是延续古树的文化价值，进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当前，曲阜“三孔”古树群入选全国首批“国保单位·古树名木”协同保护名录，为深化林建协同保护提供了重要政策机遇。立足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求，深入挖掘碑刻承载的历史保护经验，破解当前协同保护的制度与技术瓶颈，构建多维度、系统化的协同保护体系，既可守护好孔林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实现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协同提升，也能为同类文化景观的系统性保护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经验。



国保单位·古树名木

（作者单位：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）

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赋能城市蝶变焕新

——以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保护利用为例

唐嵩 陈航



大田湾体育场全景



大田湾渝超比赛现场

我国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，普遍有着经济密度高、建筑密度大、文物资源丰富等特点，也面临着文物活化利用不足、文化价值转化不充分、文旅融合方式不多等一些問題。如何进一步推动文物保护工作融入城市建设发展全局，努力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、服务当代，是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保护利用工程的竣工，为文物保护、城市更新等工作提供了实践样本。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具体案例，探索文物保护利用赋能老城区蝶变焕新的路径与做法，并总结相关经验。

案例情况

大田湾体育场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大田湾，1956年正式落成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，由邓小平、刘伯承、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主持建设。体育场依山而建，大气恢宏，建筑呈现出庄重的中国风和民族特征，承载着重庆体育的辉煌记忆，见证着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。2009年，该建筑被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大田湾体育场相继出现结构老化、设施陈旧、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，逐渐处于闲置状态。为延续城市文脉、完善公共服务、激活片区活力、回应群众期盼，大田湾体育场的保护提升成为重大民生工程与文化工程。2020年6月30日，保护利用工程启动，2023年1月建成并向市民开放。焕新后的大田湾片区，保护修缮了大田湾体育场文物建筑，整治提升了大田湾中轴文化风貌，建成开放了重庆体育公园及博物馆，打造了集文化、体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空间。文物建筑焕发出新的风采，彰显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风貌特色，延续了城市文脉、优化了城市功能、美化了城市环境。

做法路径

坚持“最小干预、修旧如旧”，筑牢文物保护根基。按照“修旧如旧、保持外观风貌、局部排危改造、功能与景观相适配、重在外观修复”的理念，在保护文物建筑物质载体的同时，重现体育场原貌，延续文脉，保留历史温度。一是“研究式”勘察设计。工程动工前，采取多种方式对大田湾体育场整体的情况进行了勘察设计。专家组除了对体育场进行分级评估、残损评估之外，还使用仪器对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，并进行历史资料研究、原始档案收集等工作，搜集到一批珍贵的文稿、设计图纸等。通过“研究先行”，在勘察设计阶段最大程度还原历史风貌。二是“绣花式”修缮施工。避免“破坏性”“整容性”修复，对体育场红墙、碉楼、看台等核心文物本体按照原始技术进行复原，保留文物的真实性。注重精细化，建筑构件实行“样品先行”，针对栏杆的修缮，先后打磨返工多次，确定了栏杆样本。每一个图案纹样的大小、尺寸、样式、色彩都尽量保证其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栏杆一致。三是“预防性”延续保护。使用新技术进行预防性保护，在整体结构的加固层面，使用了“高延性混凝土”这一新技术，其高韧性、高强

度、高抗裂性能和耐损损伤能力，能提高结构的承载力、延展性和抗裂性能，延长文物使用寿命。

聚焦“功能更新、服务全民”，激活文物现代活力。通过“文物保护+城市更新+功能完善+民生改善”的有机融合，实现了从单一文物建筑修缮到融入城市更新的华丽蝶变。一是织补空间，打通脉络。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修缮工程带动了区域市政改造、城市更新等系列工程，实现了体育场、跳伞塔、贺龙雕像、文化宫等有机连接，形成完整贯通的线路，使散落的历史文化建筑群融为一体，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步行通廊，重现20世纪50年代整体城市风貌。二是拓展功能，惠民共享。在实施保护工程的同时，拓展提升综合服务功能。利用地下空间新建停车库，缓解“停车难”问题；修缮足球场、田径场、网球场等全民健身设施，焕新贺龙广场，使大田湾从功能单一的竞技场馆转变为设施完备的综合性体育公园；配套卫生间、休息区、便利店等设施，打造“安全、便捷、舒适”的公共空间。三是彰显文化，扮靓风貌。打造体育场中轴文化通廊，还原“劳动大道”，集人行交通、城市景观、文化通廊等于一身，打造出7万平方米曲线步道、花境绿墙、休闲座椅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，实现“场在园中、园融场中”的优美环境，提升了文物的形象感、美誉度、通达性，彰显了城市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底蕴。

依托“文物赋能、跨界融合”，实现破圈传播效应。打造“体育+文化+文旅+消费”融合场景，带动周边区域“文商体旅城”融合发展，“文物+”进一步赋能片区发展。一是“文物+赛事”。2025年渝超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让此处文物建筑成为城市顶流热点，以“重返大田湾”为主题，紧扣



图3 用于砌筑民居外墙的铭文砖



图4 老城西侧南北向夯土城墙遗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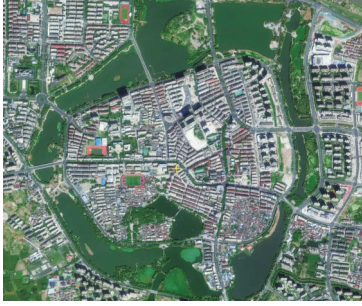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无为县城2025年卫星影像（图片来源：吉林一号卫星影像）

庆府潜山县志》城池图均记录相关水系与城市节点，为判断古城范围提供了历史坐标。实地路查中发现，古城东北侧原护城河区域正在进行河道施工，同时，在梅苑路、东城巷附近民居中发现大量旧城砖被用于房屋与围墙砌筑，部分砖面带有铭文（图3）。这些材料虽不能单独证明城墙位置，但反映了旧城建筑材料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流转，可作为判断城墙所在区域的旁证。

在老城西侧发现一段南北向夯土城墙遗址（图4），长约35米、宽约4米，高出周围地面约2.5米。结合历史地图、卫星影像及相关文献资料与现场辨识，该遗址与旧城墙存在密切关联，为古城城边界空间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。

由此可见，在历史空间经历长期变化后，需要将水系、地图、建筑材料与局部遗存等不同线索结合起来，或能逐步辨认复杂环境中的城市边界。

无为县城：城池遗存中的边界印证与庐江、古皖城相比，无为县城保存了较清晰的“老城故事”。是验证历史资料与现实空间对应关系的重要案例。

现存无为州城遗址位于今无城镇相关道路围合区域，四周仍可见环城河道；北侧与西侧河道被明显拓宽，并结合城市建设设置了廊道、绿化等现代景观设施。古城城墙已被基本拆除，如今仅东门至仓埠门一段尚存（图6）。

清嘉庆八年《无为州志》城池图显示，州城设有东朝阳门（又称东津门）、西安门门、南九华门、北迎恩门及东北仓埠门、小东门六处城门。结合1925—1930年《无为县城略图》、1969年卫星影像与现代地图进行比对，古城内部道路走向仍



图6 无为县城东侧城墙遗址

“历史情感怀旧、文物打卡体验、足球全民狂欢”定位，引爆全民关注。推出5.6元亲民票价，致敬1956年场馆建成历史。16000张门票秒罄，预约超6万人，现场21680名观众观赛，“雄起”呐喊响彻夜空，大田湾与渝超成为重庆文旅新IP。二是“文物+旅游”。结合大田湾—贺龙广场—文化宫片区风貌打造，呈现出文物建筑的“历史感”“精品味”“文化范”，“西南大区”传统风貌得以集中展现，带动大田湾、文化宫、三层马路、鹤岭佛图关等片区成为渝中区靓丽的城市窗口景观、网红打卡地和市民游客观光打卡优质目的地。三是“文物+消费”。在体育场外打造主题集市，设文创、美食、周边售卖区，汇聚特色美食与足球文创、非遗手作。联动长江索道、鹤岭二厂等文旅点位，推出“看渝超·游渝中”精品线路，带动周边3公里餐饮、零售、住宿、交通等消费升温，形成“文物引流、消费赋能、片区繁荣”的良性循环。

经验总结

坚持应保尽保、修旧如旧，注重文保成果转化，留住历史母城文脉底色。要注重健全体制机制。高站位统筹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与城市更新、文旅融合发展工作，争取高层面、大力度、多途径的保障和支持，推动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。要注重夯实工作基础。切实树立文物保护底线意识、红线意识、资源意识，把资源普查、价值梳理、名录公布、“两线”划定、规划管理等重要基础工作做实做硬，全面加强保护基础工作。要注重加强保护修缮。注重文物资源的整体性、系统性保护，精细化、“景观式”开展文物本体修缮。注重周边环境、配套设施的打造，提升文物的“形象感”“通达性”，推动文保成果向文旅资源转化。

坚持突出内涵、创新发展，构建文博公共空间格局，增添现代都市风景亮色。要注重打造文旅地标。推动单体文物建筑活化利用，与周边环境风貌适应协调，突出历史价值、注入文化内涵、鲜明文化符号，打造一批文物场馆、公共空间、“网红打卡点”等。要注重资源连线成片。按地域、分要素归集文物资源，连线成片一体化推进文物保护利用，让文物片区蝶变焕新，成为市民游客旅游观光、休闲娱乐的“新去处”。要注重保护历史风貌。综合考虑文化内涵、自然风光和建筑特色，充分考虑历史、当代、未来的关系，结合文物保护展示，建立更具人文品质、形象颜值的城市文旅空间。

坚持宣传推广、打造精品，彰显文物时代价值，焕发人文旅游品牌特色。要注重加强研究阐释。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内涵，精心实施历史人文阐释推广，全方位、多渠道、高频次开展文旅宣传工作。要注重推出文旅品牌。利用文物串珠成链打造“红色游”“研学游”“休闲游”等多种精品旅游线路，升级打造旅游产品，以优质产品供给对接多元消费需求，促进文旅消费提质扩容。要注重推进业态聚合。充分发挥文物价值，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将公共文化空间、文物建筑、商业业态深度融合、创新利用，释放综合效益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）

具有较强延续性。西门大街（今西大街）与十字街（今米市街）贯穿城区，连接西侧大街门和东侧朝阳门；南门大街（今南大街）和北门大街（今北大街）也基本保持原有走向。

从无为县城案例中可见，现代城市发展虽然会改变道路宽度、街道名称及护城河岸线等，但主要道路网络、水系与城池边界关系等仍可能存在。历史地图、卫星影像与城市现状之间的对应，使无为县老城边界得到了进一步印证。

结语

各地持续推进的现代城市建设不断改变着城市形态，相关历史遗存逐渐脱离原有环境，往往难以通过地表现察直接辨认。但老城空间并不会因实体遗存减少而完全消失，道路、水系、地名及城市格局等，仍可能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从安徽三座老县城的调查实践可知，传统城市遗存识别需要建立在多种资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：地方志与历史舆图记录了传统城市结构，近现代地图与卫星影像反映了城市变化过程，现场踏查则辅助确认历史信息在现实环境中的延续等。不同资料之间并非相互替代，而是在不同尺度上共同构成对城市历史空间的认知。

对于传统县城而言，保护对象不应局限于保存较好的城墙、城门等实体遗迹，也应关注道路、水系与城市边界关系等仍然延续的空间信息。毕竟鲜活的空间场域，时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此中的人们，相互成就、共生共荣。

综上，通过对这些线索的识别与记录，可进一步认识老城遗产（存）价值，为后续保护、展示与利用等提供坚实的基礎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）